



从五个维度推动军队战略管理创新

□ 刘德成

习主席强调，改进战略管理，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贯彻落实这一决策要求，就要着眼提高军队建设体系融入度、贡献率和效费比，紧扣练兵备战、加快转型和履行使命要求，重点从创新思维理念、提升决策能力、创新制度机制、畅通基本链路、厚实支撑手段等方面入手，充分释放战略管理的动力活力，努力开创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第一，创新思维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军队战略管理是战略筹划和长远设计，需要站在未来审视现在、立足现在设计未来。军队战略管理是系统管理，需要前瞻的理论体系作支撑。当年组织“两弹一星”、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论”就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战略管理作为军事管理的顶层，是推进以效能为核心、以精准为导向的军事管理革命的关键所在，只有突破旧思维、旧模式、旧格局，立足自身特点、自立自创体系，才不会受制于人。

第二，提升决策能力。战略管理的实质是“战略人”管“战略事”。很多情况下“战略人”的决策水平直接决定着建设目标和发展路径，影响着军队战略管理层次和质效。一旦决策滞后或者失误，就会错失良机。

调查研究的深度决定决策的精度和质量。坚决杜绝“办公室决策”和“笔尖上的形式主义”，把真相全貌、矛盾问题和对策措施搞清楚、研透彻、定实在，切实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问计于基层官兵，作出决策之前，深入了解面临问题的本质，找出其规律，谋而后断。在军队建设战略管理中，需要将智库资源、

专家论证作为执行管理的必要辅助程序，围绕重难点矛盾问题破解，以智库研究支持决策科学和方法手段科学，为高质量决策提供伴随服务和智力支撑。

第三，创新制度机制。军队战略管理是由众多主体及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运行过程充满不稳定性，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全局性，与管理微观事务相比，更离不开制度机制保障。具体而言，有5个方面。

优化需求牵引机制，主要是自上而下强化需求牵引、需求主导意识，各项建设任务对标对表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和遂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要求，优化军事需求组织管理架构，加强军事需求体系化管理、精准化开发、高质量转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备战打仗最关键、最紧要的地方。

优化督导监管机制，主要是注重过程监管，加强对项目建设全链路的监督、检查、反馈、调控等，推动军队建设各方面、各阶段、各环节紧密衔接、协调推进、持续发展，确保建设进度、资源成本、质量效益与决策意图相一致。

优化体系联动机制，主要是打破自成体系的壁垒，从体系建设的角度统筹，分领域分阶段组织攻坚会战，形成完整、严密、高效的闭合链路，逐环节、逐步骤、逐项目集中研究解决攻坚举措，激发战略管理系统效应。

优化绩效评估机制，主要是把绩效评估放在备战打仗全局中认识摆位，探索专业化常态化绩效评估方法路径，用好战略管理评估工具，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备、以评促管。

优化双向激励机制，主要是搞好评估成果反馈和转化运用，对发现的突出问题，既区分性质视情容错免责、进行弹性处理，又对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严肃追责问责，用好科学完善的表彰激励措施，有效推进军队战略管理全链路规范化和制度化。

第四，畅通基本链路。围绕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的基本链路全过程闭合管理，哪个环节掉了，整个链条就断了。释放整体效能，就要环环相扣、强链固链。

需求是前端，只有提高需求的准确性和转化率，才能谈及其他。提升规划专业性。规划是典型的“专业人”干“专业事”，提升军队战略管理工作者专业能力是提升战略管理质效的基础条件。资源成本的有限性与期望收益的最大化是战略管理的一道“必答题”。需要将依法管理贯穿战略管理全领域和各流程，用法的权威性确保资源配置合理、到位。正所谓一分规划，九分执行。健全约束规划执行的刚性制度，将规划的软约束变为时限、责任、权利、绩效的硬约束，不断提高规划工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强制力。绩效评估是战略管理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应变灵活性，持续推进规划工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强制力。绩效评估是战略管理保持相对稳定性和应变灵活性，持续推进规划工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强制力。通过自上而下分解战略目标，明确各个执行环节的战略目标、衡量指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

第五，厚实支撑手段。战略管理创新离不开科技支撑特别是信息化支撑。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重塑战略规划体系，成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抓手。

建好“数据池”。只有深刻认识

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优势，形成“用数据思考、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的数据文化，适应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发展趋势，构建科学适用的算法引擎，建设海量存储、迭代更新的“新型数据据库”，优化完善算法服务链路，抢占算法制胜高地，才能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用活“方法集”。军队战略管理模式、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手段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迫切需要深化“智能+”技术融合，创新战略管理手段。充分吸纳现代公共管理、企业管理、项目管理等科学管理方法，将净评估、战略博弈推演、博弈树选项等优秀理念和创新举措借鉴运用好，把战略管理的“工具箱”搞得更多一些，“方法集”搞得更丰富一些，建强各类方法工具的模型库、方法库和项目库，全面提升军队战略管理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

优化“措施集”。随着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军队战略管理领域出台了很多科学管用的政策制度，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就要构建富有法治化、体系化、专业化、信息化特征的战略管理政策措施。可以运用生成式AI、模拟仿真、大数据模型等军事智能化技术，加快数字服务平台建设，为项目管理提供高质高效的数据服务。



淮海战役前期的铁路争夺战

□ 王增祺

淮海战役的中心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南屏京（南京）沪，北通冀鲁，陇海铁路、津浦铁路在此交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作为对战争有重要影响的交通运输大动脉——铁路，自然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军依托铁路布局

淮海战役前，国共双方就已经围绕铁路展开布局 and 较量。1948年9月，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在分析战争态势时，得意地认为国民党军队占据主要交通线，“交通便利，有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担任运输”，而共产党军队“交通不便，除靠两条腿走以外，铁路公路皆不能完全利用”。据此，他建议利用铁路优势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华东野战军主力，同时决定“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蚌间护路，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后来由于东北战事吃紧，杜聿明被调往东北战场，该计划未能实施。

1948年10月底，国民党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并提供两种方案：一是主张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镇一律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作战略防御。二是主张退淮河南岸进行河川防御。最终采纳了第一种方案。

11月5日，淮海战役发起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直接指挥下的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部署在津浦铁路徐州、蚌埠之间100多公里

的铁路沿线两侧。企图以铁路线为依托，当某一点遭到解放军攻击时，通过铁路快速机动，将四面八方的援兵迅速集于一点，转守为攻，同时也为国民党军队随时南撤做好准备。

解放军力图断敌退路

解放军同样重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

9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城的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便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供应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第二天，毛泽东就复电粟裕等人，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打得好……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粟裕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复电均表明，打破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交通优势，并力图占领主要铁路交通线，为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全中国做准备，是淮海战役一个重要的战略目的。

1948年11月6日傍晚，华东野战军向徐州东侧新安镇地区的黄百

韬兵团出击，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打响。战局以超乎预期的速度向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11月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并于9日、10日、11日连续致电陈毅、邓小平，要求攻取宿县，截断徐蚌路。其中10日发两电：“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从电文频次之繁密和用语之急切足以看出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对于整个战局走向的极端重要性。

攻取宿县,奠定胜局

宿县地处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线上，是徐蚌交通的咽喉、国民党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和徐州防御体系的重要据点，战略地位十分突出。11月10日，刚从豫西赶到淮海前线的刘伯承便与陈毅、邓小平一起研究从速攻取宿县、截断津浦线徐蚌之间铁路的作战计划，并于11日下达徐蚌线作战命令。

12日，参战部队开始行动。孙元良兵团闻风北逃，在夹沟地区一部被歼。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乘势包围了宿县县城，随即在宿县以南设置阵地，准备诱歼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部，同时加紧攻城准备。

宿县被围，震动了徐州和蚌埠

的国民党军。但此时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东援被困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无暇他顾。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畏缩不前。14日，中野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扫清外围，完成攻城准备。15日下午发起总攻，经过10个多小时的激战，至16日拂晓全歼守敌，俘敌津浦护路司令部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与此同时，我军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了曹村至固镇的铁路100公里及沿线两侧地区。

攻克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向南的唯一补给线，并截断徐州之敌南逃退路，造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有力保障了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也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原定在淮阴、淮安、海州地区展开的会战，发展为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线、津浦线两侧广阔地域内进行的大规模南线决战。

毛泽东对此战评价甚高：“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如果要评选21世纪改变战争规则的武器，无人机绝对榜上有名。这种不需要飞行员驾驶的“空中幽灵”，从最初被当成靶子打的陪练，一步步逆成为现代战场上的“金牌杀手”。无人机是一种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来操纵的不载人飞机。根据不同标准，无人机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类型。按照应用领域，无人机可以分为军用无人机和民用无人机两大类。根据不同军事用途和作战任务，当代军用无人机又可以分为无人侦察机、无人战斗机、通信中继无人机以及电子对抗无人机等。

无人机的源起及早期运用

无人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典型的“战争催生科技”的代表。一战期间，随着军用飞机在战场上使用频次的增多，飞机损失和飞行员伤亡也随之增加。那么，能否研制出一种飞机，既能够完成常规战机的作战任务，又不会造成飞行员伤亡呢？基于这个军事需求，军事界和航空界的一些先知先觉者便开始了无人驾驶飞机的探索和研制工作。

1914年，英国的卡德尔和皮切尔两位将军提出一项建议：研制一种由无线电操纵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用于在敌方上空投掷炸弹。1917年3月，英国试飞了第一架由无线电操纵的无人驾驶飞机，由于发动机故障，这次试飞以失败告终。1927年，英国皇家飞机研究所研制出“喉”式单翼无人机并试飞成功。从此，无人机便正式告别试验阶段，成为一种可行的飞行方案。但此时的无人机尚不具备稳定飞行的能力，更不能执行作战任务，于是，研发人员在重新调整思路后最终将无人机构作“靶机”，即对空武器训练的标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人机作为“靶机”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并完美地满足了对空武器的训练需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陆军将照相机安装在无人机上用于战场侦察，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无人侦察机AN/USD-1。1962年，美国在“火蜂”无人靶机的基础上研制出“火蜂”无人侦察机，这种无人机能在2万米的高空对足球场大小的物体进行清晰拍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火蜂”无人侦察机被广泛运用于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

在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中，以色列以无人机为诱饵成功诱使叙利亚雷达全部开机，并对叙导弹基地进行准确锁定后将其全部摧毁。这场战役刷新了世界对无人机的认知：除了当作靶机和进行侦察，无人机还可以进行战术欺骗。此役也被誉为“无人机改变空战规则”的经典案例。

后冷战时代的无人机优势

冷战结束后，无人机在军事上的应用逐渐过渡到反恐战争的轨道上来。2002年11月，一架“捕食者”无人机精准锁定“基地”组织高层人物，通过发射导弹完成全球首次无人机“斩首”行动。这种挂载有“地狱火”导弹的无人机能够在目标上空连续盘旋24小时，一旦发现目标便会对其展开致命一击。在2020年9月爆发的纳卡冲突中，无人机所扮演的“坦克狙击手”角色引发世人瞩目，人们不禁开始重新审视无人机在常规战争中的作用。冲突期间，阿塞拜疆凭借土耳其提供的TB-2无人机摧毁亚美尼亚超过200辆坦克与防空系统。该无人机搭载的智能弹药可自动识别装甲车顶部薄弱部位，实现“一发一车”的高效狙杀。

由于无人机不用考虑驾驶员的存在，因此在结构设计上具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当代无人机在满足空气动力学的基础上有丰富多样的结构，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无驾驶员生命威胁。无人机上没有驾驶员，无需配备生命支持系统，简化了系统，减轻了重量，降低了成本。在执行危险任务时，不会危及驾驶员生命安全，更适合执行高危任务，可以适应更激烈的机动飞行和更恶劣的飞行环境，留空时间也不会受到人员的生理限制。

门槛降低。无人机在制造方面放宽了冗余性和可靠性指标，放宽了对机身材料、过载、耐久性等方面的要求。在使用方面，操作相对简单，训练更易上手，且可用模拟器代替真机

认识无人机进化史

□ 李国杰

从战场配角到战场主角

进行训练。在维护方面相对简单，地勤保障要求低、机动性强、维护成本低。大部分民用无人机以及部分军用无人机，都能够 在较小场地甚至可以在船舶、石油平台上起飞（发射）和回收。

配置灵活，任务多元化。由于在体积、使用、维护上的优势，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配置相当灵活，现有各类平台经过简单改装后均可支持使用。

无人机将如何影响未来战争

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中，交战双方将大量不同型号的无人机投入实战，充分展示了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多样化角色和战略价值，对战场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战争模式的深入思考。无人机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变战争形态。无人机将使未来战争呈现更加智能化、无人化的特点，甚至会彻底改变战场博弈方式。例如察打一体作战、无人机蜂群作战在可预见的未来已成为重要的空中作战样式。大量小型廉价智能化无人机以蜂群协作方式实施行动，将给传统作战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

二是拓展作战空间。无人机能够长时间、高强度执行高危任务，可以抵达太空、高寒、核生化污染甚至深海等人类受限区域，这极大地拓宽了原有战场空间，使未来战争向全域多维方向不断发展延伸的趋势更加明显。

三是降低作战成本。相对有人作战飞机或其他昂贵武器，无人机的造价通常比较低，且能取得同等甚至更优的作战效果，这无疑极大地改变了战争成本效益比，使得作战成本显著降低。一些实战案例中，守军依靠大量廉价的商用无人机精准打击进攻方的火炮，进攻方则经常利用单价仅5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守军价值千万美元的防空系统，无人机作战效益比由此可见一斑。

四是增强作战效能。无人机可配合各军兵种参与多种任务，如火力支援、战场侦察、电子对抗、通信中继和引导打击等，提升整体作战效能。其精确打击能力可实现“零伤亡”“非接触”“定点清除”等作战理念，用于打击重要军事设施或实施“斩首”行动。

五是影响战争伦理。因远离交战前线，无人机操控人员对战争残酷性的感知度势必降低，这就可能导致武力的过度、随意使用。同时，无人机系统自主化水平的提升存在超出人类规则设置与控制的风险，因技术故障等原因造成误伤误杀的可能性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

